《学术界》(月刊)
总第218期,2016.7
ACADEMICS
No.7 Jul. 2016

文化身份的认同与超越[*]

——“栅栏”的隐喻艺术与人性描写

○ 程　宇[1], 罗　虹[2]
(1. 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　经济贸易系, 浙江　绍兴　312000;
2. 中南民族大学　外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对非裔美国黑人而言,“阅读”不是游戏,只有书写自己的历史才不会被白人世界同化而失去作为群体和个体的自我,才能知道“我是谁”。站在文化民族主义的高度,奥古斯特·威尔逊在《栅栏》一剧中将大量的隐喻运用到创作之中,结合生动真实的语言及对人物冲突的成功描述,再现了一段非裔美国黑人的生存现实,帮助他们在不断审视自我与历史的进程中跨越了心灵和身份的栅栏,实现了文化身份的认同与超越。

〔**关键词**〕奥古斯特·威尔逊;栅栏;隐喻;身份

美国当代著名非裔剧作家奥古斯特·威尔逊,用二十余年的时间创作了《吉特尼》(Jitney, 1982)、《栅栏》(Fences, 1985)等十部戏剧。每部剧均以20世纪中的一个十年为背景,以编年史的方式记录了美国黑人生活的各种经历,其作品被赞誉为非裔美国文学中的世纪史诗。他曾两次获得普利策奖、托尼奖、戏剧创作奖,七次获得“纽约剧评界最佳戏剧奖”以及其它众多奖项。

奥古斯特·威尔逊的剧作之所以得到高度的认可和赞誉,一方面是因为他关注黑人文学、艺术在美国主流文化中的生存与发展,善于利用非洲文化传统及黑人特有的言说方式来彰显黑人个人和群体的历史存在并进而凸显出黑人种族的异质性;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许多作品都体现出对非裔美国人既是非洲人又是美国人双重文化身份的审视与思考。他坚定地认为,在美国社会黑人必须以非洲后裔的身份存在,必须在白人主流文化中发出属于自己的

作者简介:程宇(1981—),文学硕士,讲师,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经济贸易系英语教师,主要研究美国文学与文化;罗虹(1953—),中南民族大学外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美国文学与批评理论。

〔*〕本文系2015年浙江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身份的认同与超越:奥古斯特·威尔逊戏剧《栅栏》中的隐喻研究”(Y201533057)的成果。

声音。“除非以非洲人的身份,否则我们永远不会对这个社会做出贡献。”[1] 作为非洲文化民族主义坚强的捍卫者,奥古斯特·威尔逊在他的众多作品中都把历史视为联系现在、塑造未来的重要方式,他笔下的人物通过对历史的回望不仅成功抵制了白人主流文化对黑人文化的侵蚀与同化,也实现了黑人个人及群体文化身份的解放。

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民权运动虽然使美国黑人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条件有所改善,但他们在政治权利、经济地位、接受教育等方面仍然与白人存在着差距,依然遭受着种族歧视和压迫。面临黑人文化传统与文化身份可能被美国主流文化所吞噬、边缘化的现状,如何唤醒美国黑人的“非洲意识”,保持美国黑人的文化传统并实现文化身份的再生就成为了新一代非裔美国文学家的历史使命。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奥古斯特·威尔逊在《栅栏》一剧中以黑人清洁工特洛伊·马克森的日常生活为背景,以父子、夫妻之间的矛盾为发展主线,巧妙地将隐喻手法融入作品创作之中,结合生动真实的语言及对人物冲突的成功描述, 刻画出了性格鲜明、命运多舛的黑人形象,再现了一段在种族歧视和压迫下的美国黑人生存史。通过隐喻性的表述,作者呼吁当代美国黑人应从非洲中心文化传统出发,重新认识个人及种族历史,在不断审视自我与历史的进程中实现文化身份的认同与超越。

一、隐喻的发展与蕴涵

纵观隐喻研究的发展史,其主要可划分为传统隐喻、近代隐喻和现代隐喻三个研究阶段。传统隐喻认为隐喻是一种修辞格,是词语层面的意指,是一种语言现象;近代隐喻提出了隐喻是一种“思想之间的互动”,是新意义产生过程的观点;而现代隐喻则认为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格和一种语言现象, 更是人们认识新事物,表达新观念的一种思维方式和认知方式。

对传统隐喻研究做出最为卓越贡献的当属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他最早提出“隐喻字是属于别的事物的字, 借来作隐喻, 或借‘属’作‘种’,或借‘种’作‘属’,或借‘种’作‘种’,或借用类同字”[2],其主要特点就是“借用一事物谈论另一事物”。他把隐喻视作名词,认为隐喻是一种“对比”或“比较”,是建立在相似性基础之上的词语或短语的表达方式, 是限于词汇层面起修饰性作用的修辞格。虽然亚里士多德将隐喻等同于名词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但他的隐喻观对后期的隐喻研究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近代隐喻理论研究中最核心的理论是由英国哲学家理查兹在《修饰哲学》中提出的“互动理论”。该理论认为隐喻的意义是本体和喻体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是思想之间的“借用和交际”, 是语境之间的“交易”。“当人们使用隐喻时,就把表示两个相同事物的思想放在一起,这两个思想活跃的相互作用,其结果就是隐喻的意义。”[3] 理查兹将隐喻作为语义现象放到句子层面进行考查,将本体和喻体之间词义相互作用的结果视作新意义的产生过程,为学者布莱克进一步研究本体和喻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奠定了基础。然而,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的隐喻观或是理查兹的“互动理论”都是用一事物的某些特性来认识具有相似特性的另一事物, 都只是对隐喻进行描述式的阐释或试图探讨隐喻的产出方式, 并未就隐喻的本质及其内涵进行深入的探讨。

与传统隐喻理论和近代隐喻理论只是局限于对隐喻现象本身的研究,没有将其放在人类认知、思维和交际活动这一更大的背景之下进行考察不同,现代隐喻理论则认为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修辞现象,更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基本的、普遍的认知方式,可以用于解释人们概念的形成、思维的过程、认知的发展、行为的依据等。国内著名学者束定芳曾指出:“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 它更重要的是一种认知现象。它是人类将某一领域的经验用来说明或理解另一类领域经验的一种认知活动。”[4] 莱考夫和约翰逊在其著作《我们赖以生存的隐

喻》一书中对语言和知识的隐喻结构也作出过深刻的剖析,并把隐喻定义为:“隐喻的实质就是通过另一事物来理解和体验某一类事物,是从一个概念域或认知域向另一个概念域或认知域的结构映射”。[5]在他们看来,隐喻的焦点根本不在语言,而在人们利用一个概念域去说明另一个概念域,或者说概念域之间的映射,概念隐喻的意义源于对源域的体验和所使用的基本隐喻的源域与目标域的体验。可见,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的“映射互动”深化了隐喻理论的发展,使其从单一的语言现象、修辞格转变成了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一种认知手段。

在当代美国文坛,黑人文学家们历来都被看作是践行隐喻理论的先锋。他们以黑人特有的言说方式,即对白人主流的批评话语加以“土语”化处理来解构所谓的标准语言,其蕴含的比喻性就成为了非裔文学作品中最普遍、最典型的特征。非裔美国黑人学者盖茨就曾对黑人文学作品中的隐喻进行过深刻地描述。他说:“美国黑人传统从开始阶段就是隐喻性的。在白人统治的社会里,他们不这样就无法生存。黑人是比喻大师,他们说的是这一件事,指的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件事,这是他们在白人文化压抑中求生存的一种基本方式。所以,黑人文学的‘阅读’不是游戏,这类隐喻正是黑人传统中最具黑人特色的方面。”[6]在《栅栏》中,奥古斯特·威尔逊借鉴现代隐喻理论的研究成果,把“栅栏”视作隐喻语篇中的源喻,把“人与人的关系”“种族关系”视作目标喻,结合非洲传统文化中特有的文学、艺术表达并通过突出许多完全不同事件未被注意或未被发现的相似性,艺术性地再现了美国黑人的苦难历史及对自身文化身份的困惑。该剧不仅是对美国种族主义的无情鞭挞,更是一种对于人性的冷静分析与深入思考。通过隐喻性的表达并借用非洲传统文化因素将黑人种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展现于同一时空,作者架起了一座保证黑人种族及文化延续传承的桥梁,为美国黑人抵制白人种族主义压迫、建构自我和种族身份指明了方向。

二、隐喻的表达与体现

《栅栏》一剧的故事主要讲述了黑人清洁工特洛伊·马克森的日常生活以及他和两个儿子、妻子之间的矛盾。剧中的大儿子里昂是特洛伊和前妻的孩子,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成功的音乐家。但特洛伊并不支持他的想法,认为这种梦想实则是在浪费时间。特洛伊在年轻时曾是一名优秀的棒球运动员,但由于种族歧视和隔离政策,他被迫放弃自己的理想只能去从事一份下层黑人的工作。二儿子考利正如他当年一样,也是一位十分有潜力的棒球运动员。然而,特洛伊却坚决地反对他去大学打球,并认为那是极为愚昧的想法。但考利却有不同的观点,他希望通过体育的方式获得读大学的机会并进而融入美国主流。同时,特洛伊和妻子罗斯之间也有着深刻的矛盾。特洛伊与情人阿尔贝塔生育了一个女儿,阿尔贝塔却因难产而死亡。特洛伊试图说服妻子来养育这个孩子,善良的罗斯最终答应了他的要求,但她内心的伤痛和对夫妻感情的绝望使她变得越来越冷漠。

在作品中,特洛伊修建的栅栏和剧作的名称遥相呼应,有着极强的隐喻内涵,它不仅展现了主人公及家人真实的生活情境,更加映射出整个黑人种族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生活境遇。剧中的栅栏既是一种维系家人关系的纽带,也是一种产生距离的隔阂,既是一种保护,也是一种禁锢。对于妻子罗斯而言,她要求丈夫把栅栏修好,因为她认为栅栏是维系家庭关系,是将她和她所深爱的人保护起来的屏障。“上帝,请在我身边围上栅栏,在我的人生路上,祈求你能保护我。”[7]特洛伊的好友博诺也曾说:“有些人修建栅栏是把别人挡在外面,有些人是把自己爱的人围在一起,罗斯很爱你们,她想和你们在一起。”[8]然而对于特洛伊来说,栅栏是一种保护,更是一种产生距离的隔阂。他爱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努力承担作为丈夫和父亲的

责任,但他又不愿意只将他的爱给予妻子一人。为了摆脱情感上的束缚,他和阿尔贝塔发生了婚外情,背叛了对家庭和妻子的承诺,导致了夫妻间感情的破裂。从整个黑人族群来看,栅栏也隐喻着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种族隔离。20 世纪 50 年代的美国虽然在法律上认可了黑人的平等权利与地位,但种族歧视和隔离政策仍无处不在,黑人依旧生活在社会的边缘。作品从开头到结尾一个白人角色都没有出现,这种“角色的缺失”恰好证明了在白人和黑人族群中的确存在一堵无法逾越的栅栏,它就是一面镜子,从中看见的是黑白种族之间冲突的长期性和不可调和性,看见的是黑与白的对立。

非裔美国文化表现母体布鲁斯也贯穿在《栅栏》一剧始终,它将过去、现在和未来交织在一起,反映了美国黑人在肉体和精神上所遭受的双重迫害,隐喻出美国黑人群体为争取平等权利、建构自我和种族身份而做出的种种努力。布鲁斯起源于 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是美国黑人以个人的倾诉并结合自由感伤的民歌形式而逐步形成的一种音乐样式。它“是非洲人和非裔美国黑人利用音乐的形式对周围世界做出的反应;拥有了布鲁斯就等于拥有了自己的历史与文化,拥有了自我。”[9]它也是美国黑人在现实生活中传递文化、医治心灵创伤的重要方式,是黑人认识自我、获得前行的动力。奥古斯特·威尔逊曾评论:“布鲁斯毫无疑问是我艺术创作的源泉。它是我创作灵感的最重要来源……是美国黑人对自身所处世界的文化反应。美国黑人的思想和态度都蕴涵其中。”[10]在作品的第一幕第四场,特洛伊首先唱起了他父亲经常哼唱的老歌。第二幕第四场,特洛伊因为要求罗斯养育私生女的事情又唱起了这首老歌。在作品最后一幕,从海军部队回来的考利由于多年与父亲结下的积怨本不愿去参加他的葬礼,但母亲的劝说使他幡然醒悟,最终和妹妹一起唱起了那首承载整个家庭历史和苦难的歌曲“蓝狗”。在歌声中,考利和父亲有了灵魂深处的交流,父子之间的矛盾得以消解。剧中不同时段和场合的布鲁斯一方面成功化解了亲人之间的隔阂与矛盾,使他们摒弃前嫌、相互关爱,另一方面又成为了联系美国黑人历史和现在,记忆与现实的重要纽带。它为黑人族群冲破种族栅栏、建构文化身份,为整个黑人种族及文化传统的延续与传承提供了力量。

在《栅栏》最后一幕,特洛伊的葬礼仪式也有着深刻的隐喻意义。按照白人基督教的传统,弟弟加百利本应该用吹响号角的方式把特洛伊的灵魂送上天国,但奥古斯特·威尔逊却巧妙地使号角“失声”,让加百利用具有非洲传统文化特色的舞蹈仪式来送别主人公离去,从而唤醒了作为非洲传统的种族记忆。“他的行为强化了过去对现在的影响,利用美国黑人家庭的非洲文化传统为当代非裔美国黑人祈福。”[11]这种带有浓郁非洲中心文化传统的方式既体现出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唤醒了美国黑人对传统文化的记忆,也隐喻出作者对白人主流文化的审视态度及对非洲传统文化的认可。“不管是鲁米斯、加百利,还是特洛伊,都将白人的基督教看做是白人压迫黑人的工具,从某种程度上反对白人宗教对黑人宗教传统的同化,并通过具有非洲文化传统色彩的社会仪式唤起黑人社会对非洲中心美国黑人宗教文化的关注。”[12]利用非洲传统文化仪式来阐释过去对现在的影响,奥古斯特·威尔逊的剧作超越了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实现了美国黑人精神上的自我救赎及对历史的修正。

值得注意的是,作品中特洛伊·马克森、弟弟加百利以及妻子罗斯的名字也有高度的隐喻性。马克森的英文 Maxso 是由 Mason 和 Dixon 融合而成。Mason 和 Dixon 是 1820 年提出的农奴州与废奴州一条设想的分界线,即梅生——迪克逊分界线。一边是南方种植园经济,另一边是高度发达的北方工业经济;一边满是痛苦的记忆,另一边则是充满希望的乐园;特洛伊的名字准确地传达出他所经历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表明了他是一个对未来充满希望却又四处碰壁的失落者。从南方迁徙至北方的生活经历并没能帮助他真正认识自我,实现平等的地位与权利。弟弟加百利的英文名 Gabriel 与美国反奴运动领袖的名字相同,作者用这个名

字试图表达美国黑人为追求平等地位和权利的脚步从未停止。1800 年反奴领袖加百利在弗吉尼亚策划领导了上千名奴隶反抗运动,虽然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但他为捍卫美国黑人尊严、废除奴隶制度做出了杰出贡献。妻子罗斯的英文名 Rose 本是指玫瑰花,含有仁慈、关爱之意。在剧中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她忠诚于丈夫并关爱孩子,任劳任怨,竭力维护着家庭的稳定与和睦,用自己的坚强与爱撑起了一个完整的黑人家庭。作品中的名字恰好与她的形象高度一致,彰显出了她伟大的母爱和对家庭的无私奉献。

三、文化身份的建构与认同

文化身份研究是后现代主义研究的重要方面,也是美国非裔文学家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在全球多元文化的语境下,文化身份已然成为支撑个人和群体、标识种族精神的重要载体。荷兰学者瑞恩 · 赛格斯认为,文化身份应同时具有固有的“特征”和理论上的“建构”双重含义,即文化身份既隐含着一种带有固定特征的“身份”含义,同时也体现了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个人所寻求的“认同”之深层涵义。[13] 自从被掳掠到美洲大陆,美国黑人从未停止过重新认识自我、建构独立文化身份的努力。当黑白两种文化并存于一个社会之中时,其差异性就会导致二者之间的碰撞与摩擦。在主体与他者、殖民与被殖民、领导与被领导、霸权与反霸权的相互抵触中,黑人文学家的创作必然会以关注自身以及黑人民族的归属为中心,势必会冲破白人对黑人文化身份僵化的界定范式,在拉近与“主流”距离的同时,努力探寻出一条自我定义与表述的新途径。

《栅栏》中的主人公特洛伊在自家后院修起的一堵栅栏,从表面上来看,它可以使邻里之间和睦相处,可以用来保护自己和家人不受外界的影响和伤害,增加安全感。然而,种族意识这堵无形的栅栏实则使得特洛伊陷入了对自我身份的困惑之中。特洛伊从小饱受父亲的暴力,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他逃离了家庭。然而,离家出走并没能使他过上幸福的生活,反而由于犯下抢劫罪而被抓进了监狱。在监狱里特洛伊学会了打棒球,梦想着出狱后能成为一名职业的棒球手。但真正出狱之后他却发现,因为自己的肤色及根深蒂固的种族观念,他根本就没有一丝成功的机会。对父亲的反叛造成了特洛伊身份的缺失,阻碍了自我身份的建构,并为他和两个儿子之间关系的决裂埋下了伏笔。大儿子里昂对音乐的梦想,二儿子考利对体育的追求都在其反对下破灭了希望。其结果是,两个儿子都离他而去,与父亲的矛盾使他们自身也深陷对身份的怀疑和困惑之中。然而,奥古斯特 · 威尔逊巧妙地在结尾处,也就是在特洛伊的葬礼上,用非洲传统特色的舞蹈仪式和布鲁斯音乐将特洛伊送上天堂,实现了非裔美国黑人文化身份的重建。考利与妹妹一起唱起父亲经常唱的布鲁斯“蓝狗”,用歌声表达了对父亲的谅解。“歌声中三代人达成和解,阻隔他们其间的栅栏终于被撕开缺口。谅解之匙似乎即将开启马克森家新一代的自我建构之门。”[14]

《栅栏》中特洛伊与死神的斗争也特别引人深思。桑得拉 · 西奈曾指出:“在非裔美国文化中,同许多其他文化一样,死亡受到人的尊重。它的随意性、不可避免性、它对于财富、权利、种族、阶级或宗教的公正性以及它可怕的终结性在各种现实中最有可能使人感到谦卑。某些情况下,死亡会在非裔美国群体中引发痛苦,而在其他情况下则会成为庆典仪式。”[15] 剧中的死神是特洛伊个人的敌人,也是整个黑人种族的敌人,对死神的胜利是他个人的胜利,是整个黑人种族的胜利,更是对企图消灭他们种族文化传统与历史的各种敌对力量的胜利。正是在与死神斗争中,特洛伊认识到了自身的价值,实现了个人和整个族裔身份的建构。“特洛伊死神故事的隐喻上升到种族斗争的高度。他要建造的篱笆不再像罗斯所希望的那样仅

仅是为了保护家庭的完整与安全,而成了保证整个种族的完整与安全、保证种族文化传统不被戕害的屏障的象征。”[16]

四、文化身份的再生与超越

文学与文化研究中的文化身份主要指的是“民族本质特征和带有民族印记的文化本质特征。对于两种有着直接联系,而且相互交流、相互渗透的跨文化语境下的文学,则探讨具有某个民族的文化背景的人在另一民族的土壤里是如何维系自己的身份的”[17]。美国黑人的文化身份所描述的即是黑人的民族文化本质特征以及黑人在白人主流文化的土壤里维系自己身份的过程。从心理学角度而言,文化身份也被称为“自我同一性”,意即个体对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自我以及“与什么认同”的主观感受和体验。具有自我同一性的个体往往乐于接受不同历史阶段的自我并对自己的文化身份定位有着清晰地认识,而在以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为主导、白人至上的美国社会中,黑人对自身的文化身份认同存在着迷茫感和不确定感。一方面是为了生存而必须对白人主流文化予以认同,但另一方面,深入血液之中的黑人民族文化记忆却时时处处与所接受的民族文化身份产生着激烈冲突。杜波依斯曾指出:“在美国社会中的每个黑人都能感到他自己作为一个美国人与黑人的二重性——每个黑人都有两个灵魂、两种思维、两种难以调和的竞争和在一个黑色躯体内的两种思想的斗争”。[18]对自我身份的迷茫和不确定不仅导致了美国黑人的个性压抑与心理扭曲,还注定了他们只能在矛盾和冲突的传统中来建构自身的文化身份。在这种语境下,作为宣扬黑人文学与文化的先锋代表——美国黑人文学家肩负起了建构黑人文化身份的重担,他们在作品中通过对历史的回望、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对人性的细致思考与深入挖掘探索着黑人文化身份建构之路,以期实现整个美国黑人种族文化身份的超越。

人性是“人在其生命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全部自然属性的综合,是人在现实活动中所体现出的全部规定性。”[19]完整的人性应包含两个方面:一般的、普遍的人性和现实的、具体的人性。前者是指人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后者是指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经济、文化背景下个人的心理活动和行为,反映着心理和行动的需要。而文学中的人性则是文学家们凭借自身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和体验,经由艺术取舍和加工后而成为作品艺术魅力的重要内容。美国黑人文学家对人性的认识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从 20 世纪初黑人人性的觉醒到 20 世纪中期从“人”的视角进行自我观照,再到 70 年代以后从人性角度去发掘和研究黑人的内心世界,其在展现出黑人真实人性的同时也逐步探索出了一条超越黑人种族文化身份的道路。在《栅栏》中,奥古斯特·威尔逊在抨击和控诉美国白人社会对黑人实行种族歧视和压迫的同时,还在作品中塑造了许多典型的、极具真实性和感染力的黑人形象。这些人物与世界上其他所有人相同,也有着自己的人生目标和追求。他们所体现出的人性不卑不亢,使所有人都意识到美国黑人跟其他人一样,都是普普通通的人,不是怪物,不是洪水猛兽,因而不应该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休斯顿·A·贝克认为对美国黑人文化身份的考察不能简单地采用现成主流语言的言说方式或迎合白人权利结构的作法来解读黑人文本,而是应将黑人文学文本加以语境化处理,将其置于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中加以透视,对黑人所面临的日常社会文化生活加以关注。贝克曾评论道:“不将美国黑人表现性文化置于美国黑人文化的交互依靠的语境中,这种文化就得不到正确的理解。”[20]在《栅栏》中,奥古斯特·威尔逊对美国黑人日常生活中普通事件的叙述就成为了其凸显文学主题和建构黑人文化身份的有效工具。每个周五,特洛伊和好

友博诺都要在院子里聚会喝酒,都要把微薄的工资交给妻子罗斯,或借钱给儿子里昂。作为丈夫和父亲的优越感使他暂时摆脱了在白人统治的世界中所承受的各种屈辱与痛苦,重新认识到了自身的价值。在购置家具时,特洛伊将借钱给他的债主比喻成魔鬼,而这个“魔鬼”正是白人社会的典型象征。将诸多日常生活事件提升到人性、种族的高度,并通过幽默、诙谐的语言及夸张的文化隐喻,作者表明在白人主流的体制中,美国黑人始终处于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迷茫与困惑之中。他们只有重拾种族文化的民俗之根,重新认识个人及种族历史,才能在美国社会这个多元文化的语境中唱响自己的歌,实现文化身份的认同与超越。

在《栅栏》一剧中,奥古斯特·威尔逊将大量的隐喻运用到创作之中,结合生动真实的语言及对人物冲突的成功描述,为美国黑人指出了一条建构自身文化身份之路:美国黑人要想求得自身解放,就必须首先认识自己是谁,就必须从非洲中心文化传统出发,重新认识个人及种族历史。只有这样,黑人个人和群体才能在一个意识、文化多元的国度建构自我,才能在不断审视中实现自我身份的超越。

注释:

〔1〕曾艳钰:《当代美国黑人剧作家奥古斯特·威尔逊作品中的历史再现》,《外国文学》2007 年第 3 期。

〔2〕亚里士多德:《诗学》,罗念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第 74 页。

〔3〕Richards, 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36.

〔4〕束定芳:《论隐喻的本质及语义特征》,《外国语》1998 年第 6 期。

〔5〕George Lakoff, Mark Johnsen,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p. 5.

〔6〕Henry Louis Gates, Jr. ,“Criticism in the Jungle” in Black Literature & Literary Theory, New York and London: Methuen, 1984.

〔7〕〔8〕Wilson August, Fences, New York: Penguin Group, 1986, pp. 21, 61.

〔9〕Snodgrass, Mary Ellen, August Wilson: A Literary Companion, Jefferson: McFarland & Company, Inc. , 2004, p. 44.

〔10〕Savran David. In Their Own Words: Contemporary American Playwrights, New York: Theatre Communication Group, 1988, p. 110.

〔11〕Elam Harry J. ,“August Wilson” African American Writers, New York: Scribner's, 2001, p. 848.

〔12〕〔16〕刘凤山:《奥古斯特·威尔逊与他的非洲中心美学》,《外国文学》2008 年第 2 期。

〔13〕瑞恩·赛格斯:《全球文化时代的文学和文化身份构建》,《跨文化对话》1999 年第 2 期。

〔14〕王晶:《〈栅栏〉中代际间创伤的文化转译》,《外语学刊》2012 年第 1 期。

〔15〕Shannon, Sandra G. , August Wilson's Fences: A Reference Guide, London: Greenwood Press, 2003, p. 144.

〔17〕王宁:《文化身份与中国文化批评话语的建构》,《甘肃社会科学》2002 年第 1 期。

〔18〕Richard Chase, American Novel and Its Traditi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1753.

〔19〕管宁:《小说 20 年:人性描写的历史演进》,《东南学术》2001 年第 5 期。

〔20〕Houston A. Baker, The Journey Back: Issues in Black Literature and Criticism,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p. 109.

〔责任编辑:弘　亭〕